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 冊

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932～1945）

溫 楨 文 著



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932～1945）

溫楨文 著

作者簡介

溫楨文，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畢業、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目前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提 要

本書討論的對象是戰時商務印書館，時間斷限是從商務印書館遭受一二八事變災難打擊至商務董事會深感局勢日蹙，議決通過往長沙遷廠，準備應變開始，到王雲五離開商務為止。在內容方面，除了緒論及結論外，擬列三章、八節及若干小目來討論，以下謹就各章的結構分述如下：

第二章災難與轉折：「一二八事變」至抗戰初期商務印書館的肆應與過程。本章的宗旨即在討論一二八事變對商務印書館造成「文化」的創鉅痛深暨其「實業」戮力復興的過程，繼而說明其意義，對於後來抗戰初期商務印書館的決策與因應產生何種的影響？論述的切入點將側重商務的文化出版工作，如此更能清晰的窺知商務印書館對變局的反應之道並從中側寫出商務印書館兩大領導人物——張元濟與王雲五此間所扮演角色的全貌。

第三章上海「孤島」時期的商務印書館。本章首先將探討「孤島」時期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出版活動如何續存？從中引起文化界搶救古籍的行動，進而影響合眾圖書館的誕生，展現了另外一種「抗日救亡」的形式。接著討論抗戰期間商務印書館的最後兩次職工運動，王雲五皆明快斷然的處理，終至抗戰結束前，商務印書館不再受此「不定時炸彈」的威脅，對於抗戰後期文化出版活動的撐持有關鍵性的影響。另外，汪精衛與商務印書館的關係亦擬在此章作一初步爬梳，爾後汪氏建立的政權於教育方面與商務印書館多有接觸，而沒有發生激烈傾軋的情形，當有所關聯。——釐清這些問題，方能正確評價這一時期的商務印書館。

第四章蟄居與待曉：抗戰後期的商務印書館。本章擬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商務印書館如何在淪陷區與大後方堅持文化出版工作？上海商務印書館如何依違在日敵與汪政權間？而其為求生存計所參與「五聯」的組織又何以引發王雲五的不滿，甚而導致抗戰勝利後商務印書館復員工作之延宕。王雲五此間所策劃的復興商務印書館的工作，深受政府實力派人物的關注並給予必要之奧援，是否影響王氏日後棄「商」從政？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932～1945）／溫慎文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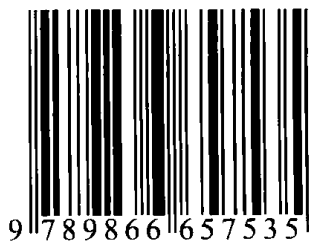
序 2+ 目 2+20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編：第 2 冊）

ISBN：978-986-6657-53-5（精裝）

1. 商務印書館 2. 出版業 3. 歷史
487.78

97012579

ISBN - 978-986-6657-53-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6657-53-5

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1932～1945）

作 者 溫慎文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七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自序

本書是在我的碩士論文〈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的基礎下踵事增華而成。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陳華老師。老師在指導我的過程中給予我相當大的想像自由與揮灑空間，憶及當初幾次見面討論時，對於我所提呈的「粗稿」，老師並不以為忤，仍親切的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最後使我的論述得以逐步成形，深慶自己能碰到這麼一位好老師。

其次，我要感謝我的兩位論文口試委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達嘉老師與政治大學的劉維開老師。兩位老師均鉅細靡遺的給予指教，使我獲益良多，這些寶貴意見亦將使我的探討益加完備。接著，我還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老師，感謝老師不吝惜展示其個人治學的心得與方法，使我獲益匪淺。

再次靜心展讀自己的碩士論文沒想到是在畢業五年後。嘴裡咀嚼著五年前出自己手的青澀文字，竟因此興起幾許回憶的況味來，從而在心裡反覆品味著那一段發生在水木清華校園中的點點滴滴。記憶的第一幕場景總是以張元老師「研究實習」的課堂情景來呈現，這是我們一般史組唯一的一門必修課，也是我們彼此相知相熟的重要開端。除此之外，值得追憶的還有清華豐富而多元的課程之旅，除了歷史所開設的課外，我們或成群結隊（哲學所郭博文老師的「歷史哲學」）、或三兩成行（人類所莊英章老師的「客家研究」、中文所王秋桂老師的「書目學」）去他所取經，並從而涵泳其中，藉此開闊了學問的視界，這些薰陶將使我終身受益；感謝黃敏枝老師在研一、研二時期擔任我的導師對我的照顧；感謝張永堂老師在我任其課堂助教時對我的乃眷與鼓勵。

在清華歷史研究所學習的歲月中，除了知識的擷取外，最重要的就是有幸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葉毅均學友，毅均的博學多聞我想從他質精品醇的單篇論文中便能略窺其端倪，而其個人最大的優點又毫不藏私，只要攸關學術上的問題、討論，

他均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的論文相關的一些問題便得到他的幫助而順利解決；賴重仁學友，見多識廣的重仁懂得非常多的東西，他對於一些英文資料的搜集有獨到之功，樂於助人的他便常幫我注意、蒐集一些英文書評資料，使我的觀點得以開闊不少；杜瑋峻學友，瑋峻的思緒非常敏銳，對於事物的觀察每有新意，與他交談常常能獲得非常寶貴的新知，使我的知識藉以增長不少。此外還要感謝幫我蒐集資料的吳佩蓉同學，有些資料是她犧牲自己休息時間幫我一頁頁從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裏影印出來的，真的十分感謝；劉子玄同學，子玄是我大學少數推心置腹的摯友之一，很感謝他爲了我向其好友黃鴻一先生（台灣大學化學研究所博士生）開口，請其借閱台大圖書館藏書，黃先生慨然應允，還直稱有需要隨時開口，真是令我感動，在此一併謝謝他。

此外，我要特別感謝詹怡娜學友，整個論文撰寫的過程幸得她的陪伴，她默默給予我一切必要之奧援，我的論文中的圖表均是經過她建議、設計而呈現的，使得我的論文在文字敘述之外，能有相對應的圖表資料佐以說明，進而增加其可讀性。最後，我要對我最親愛的家人們的支持與包容獻上莫可名狀的申謝，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寫這本論著的我。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一、問題考察 1

二、研究回顧與資料運用 5

三、論著結構 9

第二章 災難與轉折——「一二八事變」至抗戰初期商務印書館的肆應與過程 13

第一節 「一二八事變」與商務印書館的復興運動 15

一、洵乙部之總龜，非僅丹鉛之餘錄——《百衲本廿四史》 15

二、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東方圖書館遭燬 19

三、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商務印書館之復興 24

第二節 八年苦鬥的初期——「七七」到「八一三」 33

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雲五遷廠的安排與成效 33

二、戰時出版物的改革暨其文化成果 36

三、應知老去負壯心，戲遣窮途出豪語——抗戰初期的張元濟 41

第三章 上海「孤島」時期的商務印書館 49

第一節 「孤島」時期商務印書館的文化氛圍 51

一、《孤本元明雜劇》的出版 51

二、另一種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動——搶救古籍運動 57

第二節 「孤島」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勞資糾紛 67

一、怠工——一場寧靜的職工訴求 67

二、戰時的營運方針 68

第三節 汪精衛與商務印書館 73

一、汪精衛與張元濟的交誼 73

二、汪精衛與李聖五 76

第四章 蟄居與待曉——抗戰後期的商務印書館 83

第一節 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文化窘境 84

一、日人的圖書檢查與拉攏合作 84

二、士為有品乃能貧——張元濟此間的生活 91

第二節 貢獻於大後方的文化活動 92

一、重慶商務印書館復興活動 92

二、商務印書館在重慶的經營 96

第三節 復員後的商務印書館 100

一、五聯的遺響 100

二、教科書利益的維持	102
三、王雲五的去留	103
第五章 結 論	105
附錄一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至第九號工作報告書	111
附錄二 人物資料索引	165
參考書目	189
附圖、附表	
附圖一 1932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在地	11
附圖二 上海租界區域內商務印書館所在地	47
表 2-1-1 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損失統計一覽表	22
表 2-1-2 上海公會聯合會領導商務印書館反解雇鬥爭的三次聲明	27
表 2-1-3 1932 年至 1936 年中國三大出版社之新書出版數量	28
表 2-1-4 1932 年至 1935 年商務印書館叢書編輯計畫	28
表 2-1-5 東方圖書館復興運作概況	30
表 2-2-1 商務印書館戰時擲節用紙辦法	37
表 2-2-2 《中國文化史叢書》書目	39
表 2-2-3 《百衲本廿四史》出版時間一覽表	42
表 2-2-4 孤島雙周聚餐會	43
表 3-1-1 合眾圖書館初創時所收各界藏書一覽表	59
表 3-1-2 1941 年張元濟捐贈、寄存合眾圖書館書籍一覽表	60
表 3-1-3 文獻保存同志會購書、經費計劃一覽表	66
表 3-2-1 1937～1941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狀況	68
表 3-2-2 戰時（1937～1940）商務印書館代印所占營業額比例表	69
表 3-3-1 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一覽表	77
表 3-3-2 抗戰期間李聖五在《東方雜誌》上所刊載之文章	80
表 3-3-3 李聖五在汪精衛南京政權歷任職稱	82
表 4-1-1 商務印書館 1941～1945 年現金收支剩餘一覽表	87
表 4-1-2 商務印書館 1941～1945 年現金收支剩餘橫條圖	87
表 4-2-1 王雲五講演活動一覽表（1942～1945 年）	97
表 4-2-2 商務印書館 1942～1945 年間所出版專業著作選一覽表	98

第一章 緒 論

一、問題考察

1932 年 1 月 11 日，滬上日人藉口江灣路發生日本僧侶三人遭受中國人施暴並導致一人死亡，「上海事件」〔註 1〕就此爆發。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1888～1953）提出四項嚴厲要求：（一）上海市長須向日本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履行。（三）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註 2〕並限於 1 月 28 日下午六點前答覆，更有以武力威逼恫嚇者爲之推波助瀾，大有訴諸一戰的態勢。〔註 3〕一時日軍進襲閘北的消息不脛而走，閘北南市之中國居民大都避入公共租界內以求庇護，時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與總廠均處閘北火線內（見附圖一）。

〔註 1〕上海江灣路妙法寺（日蓮宗）之日本僧人大崎啓昇、水上秀雄與水上的徒弟共五人在上海三友社附近走走停停，不時四處窺視。這幾個僧人的異常舉動，引起了工人義勇軍的注意，旋即派人跟監。後在趙家巷附近，工人們攔住他們盤問。一言不合衝突隨起，僧人中有三人被打傷，受傷的三人逃到不遠處日人的東華紗廠。其中水上秀雄因傷重不治。是爲「日僧事件」，又名「上海事件」，日人稱之爲「日蓮宗僧侶殺傷事件」，成爲「一·二八」事件的導火線。關於「上海事件」的詳細始末可參閱：榛原茂樹、柏正彥合著，《上海事件外交史》（東京：金港堂書籍株式會社，1932），頁 54～100。

〔註 2〕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頁 182。

〔註 3〕當時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則挾武力對上海市長說道：「本職切望上海市長，容納帝國總領事所提出之抗日會員加暴行於日本僧侶事件之要求，速爲滿意答覆，並履行之；萬一與之相反，爲擁護帝國之權益計，已具有認爲適當手段之決心。」威脅恫嚇之心溢於言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軍民抗日運動史料》，頁 182。

是日晚上十一點過後，日軍突襲閘北，遭遇十九路軍堅強抵抗，隔天早上，日軍旋即派飛機至閘北一帶進行轟炸，商務印書館遭連續炸彈襲擊，全廠皆火，四日後又發生日本浪人火焚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之事，商務印書館損失無法估計，然而這只是一連串深重災難的楔子。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整個中國發生急遽的變化。上海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剛剛從「一·二八事變」戰火的巨創中走出，〔註4〕有鑑於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上海商務的層峰早已預作準備，經董事會議決通過：收縮上海商務的編制，遷移機器至上海英租界區、長沙、香港三地，期能維持書籍出版於不輟，並在長沙設立總管理處，香港增設香港辦事處。〔註5〕但是隨著戰爭時間的拉長，上海商務因應戰時的營運體制，發生了相當的變化。

首先是長沙方面，戰時將廠內遷本是受制戰爭因素不得不為之舉，但是隨著戰爭的逼近，機器、原料運補的困難；職工朝不保夕的恐懼感，在在都顯示出商務長沙廠的危機。況且總經理（王雲五）並不常駐長沙，更造成長沙「戰時總管理處」的名不符實。爾後王雲五（1888～1979）下達指示，將機器遷運重慶。旋即一場莫名的火，燒毀了廠房、未及遷出的機器、職工宿舍等，使得長沙廠正式走入歷史。〔註6〕

其次是香港方面。全面抗戰爆發不久之後，王雲五即到港主持香港辦事處的一

〔註4〕民國21年1月28日，日軍進犯上海閘北，翌日上午，日機轟炸位於寶山路上的上海商務總廠。2月1日，又有日本浪人潛入東方圖書館縱火，此舉造成的損失、影響更甚於前。關於這方面的紀錄可參見：何炳松，〈商務印書館被毀紀略〉；王紹曾，〈商務印書館校史處的回憶〉，均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237～249；295～315。另外，關於東方圖書館的梗概詳見：陳江，〈東方圖書館——文化寶庫和學者的搖籃〉；汪家熔，〈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均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商務印書館一百年 1897～1997》（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94～96；355～357。

〔註5〕根據商務董事會432次會議議決通過王雲五所提之備戰方案：「因時局關係，鑒於“一·二八”之難，特將閘北寶山路之製版廠及美安棧房保兵險。將總館存書除教科書外以百分之五十五派發至各分館及香港分廠，但京、杭、平、津四分館不派，漢口分館及香港分廠特為多派。擬在長沙設一小規模之印刷場，以派人前往籌備。」詳見：北京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註6〕此即歷史上所謂的「長沙大火」事件。據現有的相關研究指出，「長沙大火」與「花園口決堤」相類，均是國府「焦土作戰」方針下的戰略呈現。潘公展，〈張治中與長沙大火〉，《中外雜誌》，17.3（1975），頁68～71；何智霖，〈長沙大火相關史料試析〉，《國史館館刊》，5（1988），頁131～142；楊德才，〈焦土抗戰與長沙大火〉，《歷史月刊》，91（1995），頁114～118；王向文，〈論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焦土抗戰”政策〉（湖南中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05），頁25～30。

切事宜，並且遙制整個商務印書館人事、編輯、出版等等攸關機構生存的要項。此舉無異宣告了香港辦事處實際上就等於是戰時的總管理處。^{〔註 7〕}此種情形，雖然在整個商務印書館內部中不乏議論的聲音，但礙於戰爭之非常時期，且王雲五握有商務董事會之全權委任，所以，在戰時遂形成了上海與香港穩定對峙的情況。直到 1941 年年底為止，兩處共出版了 2352 種新書（3695 冊）；大部頭書 9 部，共 3266 種（4698 冊）；各類教科書 155 種（247 冊）。1941 年 12 月 8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進佔上海、香港，結束了商務好不容易求來的短暫安康，商務再一次面臨兵燹無情的考驗。隨著整個戰局的發展，商務產生了第二次的戰時營運體制——上海方面的精神領導與重慶方面的實際運作。

上海，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發跡之地本有其各方面的考量。直到蘆溝橋事變時，商務屹立在該地已有 40 年之久，其在上海所積累的經驗、關係更是其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瑰寶。^{〔註 8〕}所以，幾次重大的災難打擊，商務雖有遷移之舉，但總限於總經理層級，商務的董事會一直是留在上海的。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總管理處所提之議案。在程序上，它仍然是商務的最高指導單位，各地分、支館均需對其負責。所以，上海商務扮演著一個精神領導的角色是無庸置疑的，也因為董事會的靈魂人物張元濟（1867～1959）的存在，更奠定、強化了這個角色扮演。翰林出身的張元濟，學問道德均望重士林，他在戰時留在上海主持大計，抵住了汪精衛（1883～1944）政權、侵華日軍的雙重脅迫，勉力儘量開工不使機器閒置，淪為敵用，並悉心照顧滯留在上海的股東與職工們。

1941 年 12 月 8 日至 1946 年 4 月為止，王雲五在重慶總制商務的一切事宜，他將這時期分為三期：第一是應變時期、第二是小康時期、第三是復員時期。應變時期的首要任務即是財務的紓解，王氏憑藉其個人的信譽，向四聯總處（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處）貸款，解決了商務財務上的燃眉之急；小康時期則著重在持續生產出版品，使資金得以流通。據王氏的記載，這個時期，重慶商務的出版事業遠比上海商務來的蓬勃、豐富。甚至戰後復員階段，商務整體

〔註 7〕王雲五曾經說過：「自抗戰以來，我把商務的總管理處，作為流動性質，隨總經理之駐在地而定」。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755；另外，據汪家熔詢問商務老職工黃用明指出：「總管理處就是王雲五，王雲五就是總管理處」，真是一語道盡。汪家熔，〈抗日戰爭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 140。

〔註 8〕有研究者指出，文化機構的「穩定性」是塑造其機構形象的重要文化元素。詳閱：Diana Crane,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Media and the Urban Art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10～111.

的復員費用大多來自於重慶方面的資給，可見王氏在經營上確有其長才。抗戰勝利後進入復員時期，王雲五分派要員赴香港、上海「接管」業務，此舉在上海方面掀起軒然大波。咸認王氏挾怨報復，大作「五聯」〔註9〕的文章，表面上王氏取得最後的勝利，順利派李澤彰（1895～？）為經理，接管上海商務，實際上，商務從此邁入多事之秋。

上海商務印書館，位居全國出版事業的領導地位，有下列二項最重要的因素：一是教育的推動；一是知識的啓蒙。〔註10〕

商務印書館的起家，可以說是完全靠出版教科書而奠定的。〔註11〕不但在出版量執全中國之牛耳，銷售量亦佔有全國市場的一半。〔註12〕這實應歸功於商務編輯教科書人員之用心與努力，當時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均對商務高質量的教科書予以高度的評價。〔註13〕而另一方面，由商務出版的雜誌、書刊（非教科書），對於群眾知識的啓蒙，更是有巨大的貢獻，〔註14〕從這方面來觀察，單就其品質而言，是

〔註9〕 1943年，中國聯合出版公司成立，主要出資者為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五大書局，五家各派一個常委，所以別稱五聯。五聯中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汪偽政府「國定本教科書」的出版與發行。

〔註10〕 李歐梵以「啓蒙工業」一詞來稱呼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生產。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7.

〔註11〕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曾經說過在商務印書館轉向專營出版教科書後，造成「其書一出，頗有涵蓋一切之勢；營業遂蒸蒸日上。浸至新書業中，首屈一指焉」。呂思勉，〈三十年來之出版界（1894～1923）〉，《呂思勉遺文集》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7），頁377。

〔註12〕 王雲五曾提過，1902～1912這十年間，商務幾乎獨家供應全國所需的中小學教科書。王雲五，〈中小學教科書及補充讀物問題〉，《岫廬論教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174；蔣維喬指稱商務印書館為教科書的「托辣斯」。蔣維喬，〈創辦初期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 丁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397；另外，法國學者戴仁（Jean-Pierre Drege）在其著作中亦稱，商務提供了中國絕大部份的教科書，成為一個真正的「學校課本托拉斯」。戴仁（Jean-Pierre Drege）著，李實桐譯，《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14。

〔註13〕 當然，譽之所至，謗亦隨之，不滿商務印書館教科書出版品的聲音亦有所聞。如泰東書局創辦人之一的趙南公便認為：「改良教育，首重教科。商務、中華，市僧之徒，不懂教育，始終以陳舊之教科書搪塞社會。此外既無人注意及此，且無其力量，只好任其作弄。」〔1921年6月17日日記〕詳見：廣隸整理，〈趙南公一九二一年日記選〉（二），《出版史料》，2（1992），頁35。

〔註14〕 吳相，〈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1～4。另外商務印書館出版品的讀者已不限於葉文心所言均是「都市知識菁英」。參閱：Wen-hsin Yeh., "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ies: Zou Taofen and the Shenghuo Enterprise." in Frederic Jr. Wakeman and Wen-hsin Yeh ed. *Shanghai*

完全符合其出版宗旨「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爲己任」。(註 15) 因此，在其編纂過程中是講求精益求精，決無敷衍塞責、粗製濫造。

上述的情況，即便在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發展史上相對的「保守階段」，(註 16) 亦無多大轉變。但是，教科書的出版，一直是眾家必相爭食的「大餅」，不但有各出版機構在相互角力，更是各政治力量角逐之所。尤以後者所產生的問題牽連極廣，甚至連帶影響了書刊的正常出版，一連串的圖書檢查、扣留、銷燬，對於此時中國的出版業無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本書擬探討：

1. 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復興工作的經驗是否足爲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肆應變局所需？
2. 張元濟與王雲五在戰時商務印書館裏起著怎樣的作用？他們的決策與行動如何形塑了戰時商務印書館的文化面貌？
3. 戰時商務印書館對人才的管理和運用如何？勞資雙方如何因應戰爭非常之局？
4. 張元濟所主持的董事會與王雲五所領導的總管理處，是相互合作還是有所扞格、不協？對商務印書館又有何種的影響？

冀望從上述幾個方向，能夠對戰時的商務印書館有所瞭解。

二、研究回顧與資料運用

關於以商務印書館爲研究主題的論著，筆者目前所見到的有下列數種：

戴仁 (Jean-Pierre Drege)，《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原著爲法文，出版於 1978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於 2000 年發行其中文版。該書的研究重點是著重分析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務及營運成果，並在書中援引大量的數據繪製成圖表來說明，所以該書的價值在於鉅細靡遺地詳述了商務印書館的經濟狀況。書中對於經濟方面的闡述亦頗值得學習與借鏡，遺憾的是該書在其他方面的敘述稍嫌有所不足，尤其是關於歷來商務印書館與各方政治勢力相依違方面，未能適時納入其書中經濟敘述主軸來一併考量，殊爲可惜。(註 17)

Sojourn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190.

〔註 15〕張元濟，〈東方圖書館概況·緣起〉，收入：北京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21~22。

〔註 16〕〈商務五十年——一個出版家的生長及其發展〉，收入：北京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766~767。

〔註 17〕戴氏自稱其有關政治上的論述大多來自於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 《1927~1937

吳相，《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是書為一本研究商務印書館的全面之作，重點在於描述、探究商務印書館所踏過的歷史軌跡，希望從中找出一個文化企業從生存到發展的精神原動力暨發展模式，以為中國未來文化出版事業的借鑑與典範。

劉曾兆，《清末民初的商務印書館——以編譯所為中心之研究（1902～1932）》。劉氏認為編譯所之設立實為商務成為文化機構之礎石，透過編譯所延攬眾多學者加入，不但使得商務的出版品質飛躍，更造就商務與學術界的深厚情誼，也無怪乎胡適（1891～1962）因此曾表示商務的編譯所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機構，是一股教育的大勢力。（註18）

韓錦勤，《王雲五與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1979）》。該研究討論的對象是以王雲五與臺灣商務印書館之間的關係為主，時間的斷限則是從王雲五重新主持臺灣商務到他去世為止，即民國五十三年至民國六十八年。該書雖然主要在敘述臺灣商務印書館之梗概，但採取由王雲五（傳主）串起敘事主軸的寫法，也因此對於抗戰時期商務的概況亦有述及，並且描述王雲五與國府的關係甚為詳盡，可做為筆者論文處理這一課題的參考。另外，韓氏著作中所羅列臺灣當局所查禁商務書籍的紀錄，從側面提供了商務在戰時的出版狀況，可資筆者利用。（註19）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該論著以探討《學生雜誌》為主並以此闡述商務印書館為1920年代持續傳播「新文化」的主力，以出版帶有簡單時髦色彩的新文化出版品為主，其巨額資本與行銷網絡成為新文化傳播的利器，意欲突顯商務印書館在追求商機與知識的雙平衡。（註20）

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該書雖只有一冊，但是採取叢書式的編寫方式，全書共分四編：第一編，一改以罷工鬥爭為敘述重心的寫法，增加了商務發展沿革、職工隊伍之形成發展、社會背景的考察等等；第二編，敘述重點在於描寫廣大職工所進行的重大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鬥爭，同時側重中國共產黨對職工的教育活動與組織職工運動的內容；第三編，單獨把商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一書。詳見：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中譯本可見：易勞逸著：陳謙平、陳紅民等譯，《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

〔註18〕 劉曾兆，《清末民初的商務印書館——以編譯所為中心之研究（1902～1932）》（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4。

〔註19〕 韓錦勤，《王雲五與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1979）》（台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3：47～52。

〔註20〕 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頁10～11。

務中之中國共產黨史料列爲一編，藉以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商務職工運動；第四編，相關人物、重大歷史事件的文獻及回憶文章收入於此編。因此，該書充斥著對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之言，敘事立場有所偏失，但是瑕不掩瑜，這仍是一部呈現商務職工運動全貌之作，書中不乏珍貴且難得一見的職工史料。（註21）

久宣，《商務印書館——求新應變的軌跡》。相較於前，這是一本屬於泛論性質的書，作者希望讀者在瞭解商務印書館百年歷史的同時，對於其商業經營與文化出版兩相平衡之道有所體會。該書列爲「中國古代企業點石成金列傳4」，顯見其實用價值的取向。（註22）

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該書與法國學者戴仁（Jean-Pierre Drege）之《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一書，若能相互勘合校觀，可從中對商務印書館的經濟活動作一長時間的觀察，較能做出有意義的評價。再者，因爲作者任職於香港商務印書館，書中不乏運用外人不易見到的印書、編書、售書等珍貴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對於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史上的重要性將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也是此書的最大貢獻。（註23）

樽本照雄，《初期商務印書館研究（增補版）》。是書鉅細靡遺地描繪商務印書館的草創期深受日本文化方面（如翻譯、教科書的編寫）影響，1903年更與日本金港堂合作（兩者合資經營持續了十年〔1903～1914〕），使得商務印書館在編輯、印刷、經營上進入嶄新的里程碑。（註24）另外，在2006年，樽本照雄將其長期研究商務印書館的相關論文集結成書以《商務印書館研究論集》出版，是書最大的特色是作者對於商務印書館的相關人事物詳加考訂，並佐以中日研究此一課題的專家學者們的心得，在討論他人研究成果的同時亦適時修正作者自己對商務印書館的觀察。上述兩本樽本氏的研究論著，是提供後人瞭解商務印書館早期歷史（1915年以前）的重要研究著作。（註25）

對於商務做出巨大貢獻者當推張元濟、王雲五二人。對於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關係的研究，葉宋曼瑛的著作《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是一部

（註21）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註22）久宣，《商務印書館——求新應變的軌跡》（台北：利豐出版社，1999）。

（註23）梁元生，〈序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收入：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2。

（註24）詳見是書的第2章〈金港堂〉與第3章〈日中合弁〉。樽本照雄，《初期商務印書館研究（增補版）》（滋賀縣：清末小說研究會，2004），頁160～167、185～212。

（註25）樽本照雄，《商務印書館研究論集》，滋賀縣：清末小說研究會，2006。

值得參考的作品。作者描述傳主的一生，實則勾勒了商務印書館的歷史面貌。瞭解張元濟其人，就能對商務的企業文化有深刻的體認，要說張元濟是商務的精神導師絕非過譽之詞。（註26）

至於王雲五，在商務的重要性與張元濟實屬伯仲之間。儘管對於王氏，商務館中同仁的評價是毀譽參半，其挫折大多來自於人事管理問題上，（註27）但其所展現的管理能力，及卓越的商業謀略，都不容否認他是企業主最為安心的委託人。甚至在其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一職期間（1930～1946），更締造了商務出版的高峰。根據《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一書顯示，1932年至1936年間，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黃金時期，期間共出版了5788種出版品，冊數高達13515冊，平均一年出版1158種出版品，2743冊。（註28）從此亦可以看出，王雲五與張元濟之差別。楊揚所寫的《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一書中，即把張、王二人視為描繪商務興衰史的兩大敘述軸線，介紹了知識份子如何接續文化命脈於漫天烽火之中，不僅書寫商務的歷史，亦是完整呈現了商務的精神。（註29）

另外關於商務印書館方面的資料，以王雲五編著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一書，內容最為翔實。該書除了詳盡介紹商務做為中國近代教育發展中的角色，並且因為作者長時間擔任商務要職，書中羅列商務內部資料甚詳，可視為第一手史料來運用。其他回憶性的文章，則散見於北京商務印書館編輯部所編的《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一百年》；王壽南主編《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蔣復璁等著《王雲五先生與近代中國》等書。另外，相關人物之日記、年譜、書札、傳記等更是深具參考價值且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註26〕 Man-ying Ip., *The Life and Times of Zhang Yuanji 1867～195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關於張元濟的相關研究，可參閱：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汪家熔編著，《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成都：人民出版社，1985）；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5）；海鹽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張元濟圖書館編，《出版大家張元濟：張元濟研究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註27〕 關於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職工的對立梗概，可參閱：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編寫組編，《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86～98；〈商務印書館試行編譯工作報酬標準辦法糾紛記〉，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 丁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414～422。

〔註28〕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

〔註29〕 楊揚，《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關於王雲五的傳記可參閱：郭太風，《王雲五評傳》（上海：上海書店，1999）；胡志亮，《王雲五傳》（台北：漢美出版社，2001）。